

短篇小說新作选

延安大学中文系

文艺理论教研室编

目 录

努力写好革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	
.....	《人民日报》评论员(1)
革命文艺的神圣使命——从《神圣的使命》谈起	
.....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7)
班主任	刘心武(19)
顶凌下种	成一(48)
高洁的青松	王宗汉(70)
命 运	曹鸿骞(97)
献 身	陆文夫(113)
灵魂的搏斗	吴 强(138)
复 婚	舒 展(161)
最宝贵的	王 蒙(172)
丝瓜累累的时节	高 红(178)
“不称心”的姐夫	薛庚寅(187)
姻 缘	孔捷生(207)
伤 痕	卢新华(227)
爱情的位置	刘心武(241)
解瑛瑶	葛广勇(269)
神圣的使命	王亚平(285)
醒来吧, 弟弟	刘心武(322)
入 党	宗福先(344)

努力写好革命人民同 林彪、“四人帮”的斗争

《人民日报》评论员

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最近出现了一批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余毒为内容的短篇小说。从刘心武的《班主任》（《人民文学》一九七七年十一期）开始，我们陆续读到了吴强的《灵魂的搏斗》（《上海文艺》第五期），关庚寅的《“不称心”的姐夫》（《鸭绿江》第七期），卢新华的《伤痕》（八月十一日《文汇报》），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人民文学》第九期），刘心武的《醒来吧，弟弟》（《中国青年》第二期），等等。这一批作品激起了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强烈反响。许多同志给予热情的赞扬，有些同志对某些作品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报刊上对一些作品开展自由讨论，广开言路，这对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造成生动活泼的局面，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是大有好处的。

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毛主席说过：“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评判一篇作品的好坏，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因为人民群众是文艺创作描写和反映的主要对象，是文艺服务的主要对象，又是文

艺作品最直接、最经常、最广泛的鉴赏者。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智慧。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不是少数人说了就算数的，而是要通过实践的检验，由广大人民群众来评定。在这方面，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他们会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这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愿望和要求的标准）去衡量和判断。

《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短篇小说刊出以后，广大读者争相传看，议论纷纷。他们在表示热情欢迎的同时，也针对某些作品的不足，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希望。这就充分说明，人民群众是有判断是非的能力的。因此，评论文艺作品要多听群众的意见。对文艺创作和评论中的是非问题，靠行政命令来解决是不好的。

《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作品的出现正是揭批“四人帮”斗争深入发展在文艺创作中的反映。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设置许多禁区，制造种种禁令，扼杀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弄得“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整个文坛百花凋落，万马齐喑。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清算林彪、“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冲破他们设置的禁区和禁令，在题材、体裁、风格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

《班主任》等一批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流毒、影响为主要内容的短篇小说的出现，就是文艺工作者进行探索的初步成果。尽管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许多作者是初学写作、缺乏经验的青年，作品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

点和不足，但大部分作品的基本倾向是好的。我们应该容许作家，特别是青年作者总结经验，改正缺点，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作家们敢于拿起自己的笔投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战斗，敢于对现实生活中许多问题进行思考，敢于反映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所造成的人民群众生活中和精神上的“伤痕”，敢于在艺术上进行大胆的尝试，是很可贵的，应该给予热情的支持。在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中，应该允许这些新花开放。

运用各种文艺形式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及其流毒、影响，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文艺是反映生活并反作用于生活的。一个对革命对人民负责任的作家，要正视而不要回避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是我们时代现实生活中最重大的问题，因而也是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重大题材之一。现在，“四人帮”虽然已被粉碎两年了，但是林彪、“四人帮”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流毒和影响，还严重存在，清除这些流毒和影响，还需要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巨大的努力。正如华主席指出的，揭批“四人帮”仍然是全国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用文学艺术的手段，积极投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应该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选择不同的题材，从不同的角度，对林彪、“四人帮”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对他们那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人民群众身上的“内伤”进行批判和触动，帮助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本

质，认清他们推行的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使人民群众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更加仇恨林彪、“四人帮”，更加热爱华主席领导下的新历史时期的美好战斗生活。

文艺作品对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流毒、影响进行揭露，不能说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作品就是“暴露文学”。我们的文艺创作，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黑暗势力以及旧社会剥削阶级所遗留的恶劣影响是应该加以暴露的。毛主席说：“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林彪、“四人帮”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组成的黑帮，是我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就是剥削者和压迫者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出现是旧社会污泥浊水的沉渣泛起。对于他们这一伙，我们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革命的舆论，包括革命的文艺，进行揭露和批判；对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也要通过揭露和批判，加以肃清。这种揭露和批判，正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正是歌颂革命人民不可征服、不可战胜的坚强意志，怎么能说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暴露文学”呢？

文艺是通过艺术形象，通过典型化的方法反映生活的。因此，运用文艺形式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及其流毒和影响，必须解决好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

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文艺工作者要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毛主席提出的这些原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作品所描写的事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短篇小说的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生活的某一本质方面进行了较好的艺术概括。但是，其中有的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还可以提高。比如有的作品如果描写人民群众的力量，表现人民群众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更充分些，就可以塑造出更为生动更为典型的同“四人帮”作斗争的英雄的艺术形象来；有的作品的某些情节、细节的真实性还可以多推敲一下。许多读者对某些作品提出的批评和希望是有道理的。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都有它的两重性。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在“四害”横行时期，一方面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凶残，另一方面是革命人民英勇的斗争。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声讨“四人帮”的英勇搏斗，全国各地人民以各种不同形式反对“四人帮”斗争的正义行动，不就是历史的见证吗？尽管作家选择的题材和表现的主题有所不同，不能作刻板的规定，但就本质上说，文艺创作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黑暗势力的揭露和批判，在暴露他们的罪恶的同时，还必须充分表现人民群众同它所进行的斗争，要写出人民的力量，要显示出人民必胜的前景，

塑造出同这种黑暗势力作斗争的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我们的时代精神，使人们通过艺术形象的教育感奋起来。这样才能很好地发挥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这是现实生活中本质的方面，如果忽略了这一点，作品的艺术效果是会不同的。

《我们时代的斗争生活是壮丽多彩的。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余毒和影响为内容的作品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方面，但光有或主要是这方面的作品是不够的。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文艺创作的题材要多样化，以现代革命题材为主，特别要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三大革命运动，也要重视历史题材和其他题材。”华主席还号召：“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有雄心壮志，努力创作出反映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业绩，反映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战斗历程的优秀作品。”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经历了漫长的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斗争，创造了伟大的英雄业绩，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今天，全国各族人民继承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遗愿，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进行新的长征。中国人民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斗志是高昂的，精神是振奋的，八亿人民正在以巨人般的步伐，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挺进。我们的文艺应该谱写我们时代的英雄凯歌，唱出我们时代的最强音。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工厂、农村、部队，深入生活，努力搞好创作，用各种文艺形式，反映出新长征中各种英雄的业绩，塑造出新长征中的各种英雄人物，描绘出我们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壮丽图景吧！

革命文艺的神圣使命 (一)

革命文艺的神圣使命

一一从《神圣的使命》谈起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些作家努力摆脱“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三突出”的枷锁，冲破“四人帮”设置的禁区，写出了一批较好的作品。其中，如《班主任》、《伤痕》、《灵魂的搏斗》、《命运》、《复婚》、《最宝贵的》、《“不称心”的姐夫》、《高洁的青松》、《醒来吧，弟弟》和见于《人民文学》一九七八年第九期的《神圣的使命》，由于从人民群众个人生活遭遇和性格变化的深处，展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过程，着力揭露“四人帮”给予人们的精神创伤，挖掘他们对于“四人帮”的仇恨，对于党的热爱和对于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是，人们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议论。比如说这些作品是“暴露文学”，为什么要写阴暗面和悲剧，写这样的作品，会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议论，涉及到文学创作的某些重大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澄清。

(一)是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华主席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什么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从华主席的讲话中，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清除“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只有党和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才构成前进的、革命的历史潮流。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捂盖子、包庇“四人帮”，破坏和阻止清查“四人帮”的罪行，甚至继续迫害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干部和群众，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揭露“四人帮”的罪恶，批判“四人帮”的路线，是肯定和保卫文化大革命。这种揭露和批判越深刻、越彻底、越有力，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也保卫得越牢靠。

《神圣的使命》揭露和批判的对象，是徐润成、裴发年、杨大榕这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是他们篡党夺权的罪行，是他们害死省委书记陆青的秘书、公安人员王公伯和制造白舜冤案的反革命活动以及搞阴谋诡计、直到不惜用亲生女儿的名誉进行政治赌博的卑鄙行径。如小说指出的，他们“代表了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一股黑暗势力”。难道他们这些活动，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吗？难道对他们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有利的鞭挞，不是真正在肯定和保卫文化大革命吗？

作品还从另一个角度，歌颂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就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空前提高了。斗争锻炼了群众，使他们更加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更加具有区分敌我、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这是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历史的主人的重要标志。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北京和全国各地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洪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因为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郑局长、王公伯才在一九七五年，遵循党中央的指示，为了替被诬陷的同志平反昭雪，有勇有谋，毫不退缩，针锋相对地投入揭发徐润成、裴发年、杨大榕的斗争。小说也写了冤案受害者白舜、林芳，公安干警陈清水、吕萍，教师吴正光在斗争的洗礼中觉悟提高的过程。就连艾华，这个一度成为父亲的工具的受害者，最后也反戈一击。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和他们在斗争中的坚强团结，同时表明了“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已经人心丧尽、众叛亲离。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写出了典型环境，写出了时代精神。白舜说：“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象大江奔流，难免挟着泥沙俱下。”它淘出了象郑局长、王公伯、白舜这样的真金，也淘汰了象徐润成、裴发年、杨大榕这样的泥沙。肯定郑局长、王公伯、白舜等人，正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相反，不去揭露徐润成、裴发年、杨大榕，就不能叫做肯定文化大革命。

因根本非前部而想知各案面開光景

面，“更論义主会考”（二）关于写阴暗面 面部則需附
关特查美升研余與前部藝器上麻系关主前部則京干想育且

土 如果不是进行经院哲学的讨论，那么，首先应该弄清

的，不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写阴暗面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阴暗面，怎样看待和区别阴暗面以及怎样写阴暗面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光明的，作为一个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作为一个还有待于我们不断认识其发展客观规律，不断在实践中改正缺点和错误以符合客观规律的社会，它又存在阴暗面。毛主席就曾说过，必须发动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阴暗面。可见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阴暗面。在无产阶级看来，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首先就是指“四人帮”这样的阶级敌人的干扰和破坏。与此相反，“四人帮”则把自己写成神圣，把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阴暗面”来横加诬蔑。在他们那里，光明面和阴暗面是颠倒的。《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等毒草作品，就是他们这种观念的标本。长期以来，由于“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高揭露阴暗面，成为文艺创作的禁区。通过白舜的冤案，揭露“四人帮”制造的阴暗面，激起人们对于“四人帮”的憎恨，是《神圣的使命》的一个重大成就。小说没有只写阴暗面。有阴暗面就有光明面。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光明面总是占主导地位的。白舜一家不幸和王公伯的被害，尽管使人潸然下泪，悲愤不已，但是，小说却始终表现出党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这就是光明面，这就是光明面终将战胜阴暗面的根本原因。

揭露阴暗面，不仅不是什么“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有助于克服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残余和代表这种关系的政治力量；有助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上

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许多环节还有缺陷，这些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是束缚生产力、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因此，华主席说：我们要有勇气“正视和揭露我们的具体政策、规章制度、工作方法、思想观念中那些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的东西，有魄力去坚决而又妥善地改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就冤案来说，它的产生，当然首先是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但是，又不能完全忽视它同我们具体政策、规章制度、工作方法、思想观念中的某些落后的、错误的东西的关系。既然如此，白舜的冤案，难道不是既有助于我们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又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进行关于健全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研究吗？

即使是阴暗面并未完全得到扭转，也是可以写的。在《班主任》中的宋宝琦、谢惠敏和《伤痕》中的王晓华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情形。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但是却并不以完满地解决而收尾。这是无可指责的。矛盾就是过程。只要在作品描写的范围之内，按照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矛盾还没有达到彻底解决的程度，阴暗面还没有全部转变为光明面，那么，作家又有什么必要，非得离开生活的真实，仅仅根据某种抽象的原则，去唯心地生造一条光明的尾巴呢？当着作家揭露了阴暗面，同时又写出了在它周围存在的朝气蓬勃的、向上的力量时，他实际上已经再现了光明面必然战胜落后面的历史趋势。

文艺作品要通过艺术典型化的过程，反映生活中的矛盾

和斗争。阶级斗争，就是光明面和阴暗面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人民内部先进和落后的斗争，也反映着光明面和阴暗面的斗争，虽然它在多数场合并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在不断地揭露和战胜阴暗面的斗争中，我们的英雄人物层出不穷，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巩固。人民不会欢迎掩盖现实矛盾的虚假的作品，不会欢迎离开阶级斗争、离开先进同落后的斗争的苍、白无力的形象。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完全适用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文艺。如果认为，暴露了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暴露了敌人以及他们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社会主义就要塌台，那不是出于无知和误解，就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公开嘲弄。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来说，越是敢于揭露和彻底地批判阴暗面，就越能推动现实的革命发展，相反，在阴暗面前缩手缩脚，迁就屈从，倒是对于人民事业的犯罪了。

(三) 关于悲剧

研究社会主义文艺中的悲剧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历史的前进，不会走笔直的道路。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有曲折和反复，人民群众就会有痛苦和牺牲。“四人帮”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没有痛苦，没有悲剧的谬论，是一种十足的欺人之谈。毛主席就批评过我们的某些干部“不了解和不关心人

民群众的痛苦”的错误。在“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下，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多年没有提高甚至有所下降，无产阶级道德和社会风尚被严重败坏，老一代革命家、老劳模、老工人付出重大的牺牲，青年一代不仅被剥夺了青春，而且落下了这样那样的伤痕。“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牵四挂五、株连九族，更加给受害者带来深重的灾难。“四人帮”是造成人民痛苦的元凶。对于这样的现实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反而沉湎于关于应该不应该写悲剧的空泛议论，至少是颠倒了文艺和现实的关系。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但是，这不是一蹴即至的。它总是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甚至付出牺牲，才能取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定阶段，也会出现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的冲突”。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人物，与过去时代的悲剧人物不同。他们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是历史的自觉的主人。对于他们说来，暂时的挫折和失利，只是达到最终胜利的步骤。象《神圣的使命》中的王公伯、白舜，把自己的命运，同党、同社会主义制度、同人民群众的痛苦联系起来，面临生死的考验而决不退缩一步。他们的悲壮的、战斗的经历，不是使读者消沉，而是始终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悲剧人物，也是社会主义的新英雄。有些同志担心，写悲剧是否会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党的领导。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们不知道，写悲剧，歌颂同悲剧制造者进行斗争的英雄人物，正是暴露和批判剥削阶

级，正是维护社会主义，维护党的领导。描写王公伯、白舜的悲剧，描写艾华、谢惠敏、王晓华的悲剧，描写宋宝琦的悲剧，不正是激起了人们对于“四人帮”的仇恨吗？不正是在鼓舞人们同“四人帮”进行斗争、更快和更彻底地清除他们的流毒吗？这样的作品，写“四人帮”之罪恶，抒人民之悲愤，怎么会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党的领导呢？

由于“四人帮”的禁锢政策，许多文艺工作者对悲剧望而生畏，生怕一个“悲”字。其实，悲愤出诗人。只要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真实地反映他们的呼声，无论是悲剧的内容还是悲剧的形式，在社会主义文艺的灿烂的百花园中，完全可以和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四）《神圣的使命》的现实意义

打开《神圣的使命》，在徐润成、裴发年、杨大榕的活动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思想，这就是“四人帮”的那个“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同样，在王公伯、白舜、林芳、陈清水、吕萍、吴正光和艾华后来的活动中，又始终贯穿着另一种思想，这就是反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杨大榕等制造了白舜强奸幼女的冤案，给省委书记加上害死秘书的罪名，旨在拔掉这个阻碍他们篡党夺权的眼中钉。白舜置生死于度外，写了揭发信。王公伯见义勇为，他深深地感到：“眼前这场斗争，绝不仅是处理一宗个别人的冤案，而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它牵动着好些个

人！它将使妖魔现出原形，使正义得到伸张，使人民的觉悟大大提高。”《神圣的使命》的重大价值，就是它艺术地、形象地批判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反映了人民群众反对这一纲领、反对“四人帮”的斗争。

在“四人帮”的控制下，由他们及其帮派骨干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是不可能得到平反昭雪的。王公伯为白舜案件屡经奔波，结果只能弄清原委为止，自己却被加上一大堆罪名，含恨而死，就是证明。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就其本质来说，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同冤案、假案和错案格格不入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冤案、假案和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落在了我们广大干部的肩上。如果我们的干部不去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不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积极地进行这种工作，那就会败坏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崇高声誉。华主席指出，“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中央根据我们党历来倡导的有错必纠和错多少平多少，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的精神，在短时间内，领导平反昭雪了大量冤案、错案和假案。这是大得人心的。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到目前为止，平反昭雪冤案、假案、错案，仍然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